

产业融合与包容性绿色增长 ——以湖北神农架林区为例的考察

檀学文 刘梦婷

摘要 欠发达地区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亟待回答的重大问题。包容性绿色增长与新发展理念高度吻合,但往往面临市场失灵、公平失灵以及治理失灵的障碍。作为产业转型的基本路径,产业融合可以通过技术赋能机制、结构优化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有效地克服三大失灵,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区域整体性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战略有利于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价值,可为产业融合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创造良好条件。产业融合产生的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积极成效,通过示范效应、技术投资回报效应以及生态保护意识的强化,可以反过来促进产业融合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正反馈效应。包容性绿色增长可以使预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顶点向左移动,是兼具生态脆弱性和特定生态环境优势的欠发达地区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一个可行选项。

关键词 产业融合;包容性绿色增长;绿色转型;欠发达地区

中图分类号 F12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5)06-0112-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059)

我国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后,贫困地区如何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新发展阶段亟待回答的重大问题。尽管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增强欠发达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但现有研究仍然主要关注欠发达地区帮扶政策的调整延续而不是如何自生发展。资源禀赋薄弱、经济增长乏力、生态环境脆弱以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都是贫困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与此同时,以脱贫地区为主体的欠发达地区也具有地方特色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足、生态条件优越等潜在优势。从而包容性绿色增长由于兼具包容性和绿色化而逐渐受到重视,为破解欠发达地区高质量发展困境提供了潜在方向。包容性绿色增长是包容性增长和绿色增长的复合体,强调在持续性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负担,确保增长成果广泛分享,特别是关注弱势群体的参与和受益,这与新发展理念高度吻合^[1](P4-18),对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多重目标属性使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复杂障碍和挑战。

作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产业融合得以在全国范围广泛开展。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同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印发。2021年以来,历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已有先行地区通过产业融合探索出了兼具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发展道路^[2](P150-159),为实现包容性绿色增长提供了实践样本。然而这一实践活动尚有一系列理论问题有待揭示和回答。如何破解包容性绿色增长在欠发达地区面临的障碍;包容性绿色增长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能产生怎样的作用;作为新的产业发展方式,产业融合如何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利于探索新发展阶段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实现机制和路径,对推进贫困地区发展方式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政策涵义。

一、文献综述

包容性绿色增长是由包容性增长和绿色增长两大理念耦合而成的创新发展理念,掌握这两个基础概念是理解其内涵的关键。绿色增长是为了应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源耗竭和生态环境恶化问题而提出的发展理念^[3](P41-54)。这一理念强调各国应着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此外,由于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增长进程或从增长结果中平等受益^[4](P5-39),因而包容性增长也日益受到关注,被视为一种创造和扩大经济机会,并确保社会成员能够参与其中并受益的增长模式。比较而言,绿色增长强调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性,包容性增长重点关注社会成员是否平等获得就业机会以实现广泛受益的增长。尽管二者都是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但它们并非总是一致的,绿色增长的结果也可能使穷人失去更多机会^[5](P215-228)。包容性绿色增长在这两者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兼顾发展的包容性与绿色化,逐渐成为国际共识。2012年,世界银行在“里约+20”峰会上首次提出包容性绿色增长概念,旨在将经济的包容性和绿色化相结合^[6](P5-42),既指明了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理论内涵,又列示了其实现的可能障碍和可行路径。然而值得指出的是,世界银行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战略更多聚焦于绿色增长,对包容性的探讨未置于同等地位。随后国内学者对这一概念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杨雪星提出包容性绿色增长是一种旨在通过绿色投资和绿色技术,促进经济效率、社会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模式^[7](P42-48);吴武林和周小亮则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必须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具备可持续性、包容性和生态环境友好特质^[8](P27-37)。虽然现有文献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内涵的界定尚未达成一致,但都将效率、公平及环境视为关键属性特征。

进一步地,一些研究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实现路径进行了探讨,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等角度^[9](P113-135)^[10](P162-174)。这些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为包容性绿色增长创造了必要的外部环境和技术条件。相较之下,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求数字技术发展与基础设施完善,还涉及经济成果惠民、生态文明建设等多方面内涵^[11](P3-20),因而更具备推动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全面性。农村产业融合作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12](P120-129),能够推进产业之间的协同和价值链延伸^[13](8-18),塑造绿色的产业发展模式和新的利益分配格局^[14](P22-29)。不少学者讨论了产业融合对包容性增长或绿色增长的推动作用。就包容性增长而言,有研究认为产业融合能够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15](P132-144),缩小农户收入差距^[16](P105-118)。关于产业融合与绿色增长的关系,有研究指出产业融合能够推动产业绿色转型^[14](P22-29)。胡平波和钟漪萍分析发现产业融合有益于提升农业生态效率^[17](P85-104)。

以上研究表明了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理论可能,但多数研究仅从单一视角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的经济效应或生态环境效应,尚缺少对产业融合促进整体性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内在逻辑与实现机制的分析。鉴于此,本文重点开展两方面研究:第一,将产业融合的经济效应与生态效应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探讨产业融合与包容性绿色增长互动的内在逻辑;第二,开展案例分析,在脱贫县情境中考察多重政策叠加下产业融合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实现机制和作用路径。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本部分首先探讨了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理论内涵及实现障碍,其次分析了产业融合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内在逻辑,最后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设计情况。

(一) 包容性绿色增长再界定

包容性绿色增长基本内涵明确,却仍有大量对其概念界定的研究,主要是由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目的导致。从经济学和政策分析角度对包容性绿色增长重新定义,可以增强概念对研究问题的适用性。

1. 包容性绿色增长是在经济、社会和生态维度同时具备可持续性时的理想状态。首先,经济增长要

能够维持一定速度。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要创造条件实现经济起飞,经济发展速度不能大起大落。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要在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后注重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次,经济增长应具备包容性。包容性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在本文情境下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在经济增长资本密集化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优化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使劳动分配比例趋于提高或至少不降低;在存在绝对贫困的国家,经济增长要具有益贫性;在已经消除绝对贫困的国家,经济增长要避免对低技能劳动者的排斥,就业机会要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再次,经济增长要具备绿色化特征,一方面,依据国家政策法规减少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低效利用,另一方面,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以及提高产品生态价值。

2. 包容性绿色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绿色化日益增强并且相互协同的发展过程。在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三大要素中,持续性经济增长是前提,包容性增长以及绿色增长寓于其中。如果单纯遵循经济逻辑,在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的条件下,经济增长未必都能具备包容性或绿色化特征,两者之间可能相互冲突。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揭示,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在收入较低阶段环境与经济增长似乎不可兼得^[18](P13-57)。因此,研究视域中的起点往往是经济增长的非包容性以及非绿色化,要通过激励约束机制设计以及政策引导,实现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绿色化的协同促进。而能否在较低收入水平下提前进入污染下降阶段,即实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左移,是关乎包容性绿色增长理论在欠发达地区能否适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的关键。

3. 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结构性、区域性、阶段性等开放性演化特征。如果说包容性与绿色化的协同是就整体性包容性绿色增长而言的,而可观察到的现实中的增长形态却往往具有结构性、区域性、阶段性等特征,既是演化的,也是开放性的。结构性特征是指经济增长的速度、水平、包容性、绿色化程度不同步,同等条件下有的包容性更强,有的绿色化更好;区域性特征既指同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整体水平存在差异,也指在同等经济增长水平下,不同地区增长的包容性或绿色化程度存在差异,有的侧重于包容性,有的更注重绿色化;阶段性特征则是指全球范围以及国家或地区层面,经济增长的包容性与绿色化随时间推进而变化。综合以上演化特征,从时间截面看,包容性绿色增长可以体现为部分区域更强的包容性以及部分区域更好的绿色化,即存在空间开放互补特征。

(二) 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实现障碍

包容性绿色增长追求经济发展、社会公平与生态保护等多重目标的协同发展,这一理念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复杂障碍,能否真正实现“鱼与熊掌兼得”也存疑。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市场失灵和治理失灵是阻碍包容性绿色增长目标实现的主要问题^[6](P29-146)。显然,这些问题主要是就绿色增长而言的,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并不充分。根据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关于包容性增长的研究,公平失灵是其关键障碍^[19](P50-56)^[20](P12-15),从而市场失灵、公平失灵以及治理失灵构成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主要障碍。

1. 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制约包容性绿色增长主要体现为外部性以及信息不对称,导致生态保护动力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以及绿色产品市场发展受限。外部性是指一方的行为对另一方的福利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未得到补偿,进而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和社会福利的减少,其在生态保护和绿色增长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生态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性长期以来未能内化到市场交易中,导致生态保护和绿色投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污染排放、资源过度开采等负外部性的成本也未由相关主体承担,加剧了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柠檬市场”理论表明,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低质量产品由于具有价格优势会逐步占据市场主导地位,而高质量产品则因无法获得合理定价而被迫退出市场^[21](P488-500)。在绿色产品市场中,这不仅会削弱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信任感,还会导致企业因无法获得相匹配的市场回报而缩减绿色投资规模,进而影响绿色产业的整体发展。

2. 公平失灵。社会公平不足限制了低收入群体在绿色增长过程中的受益程度,是包容性绿色增长无法回避的问题。公平正义是公认的社会目标,却难以真正实现,即产生公平失灵。公平失灵包括政治、机会和分配三个方面的公平失灵^[22](P97-115)。在本文语境中,公平失灵主要表现为机会和结果不

公平。机会不公平指个体在获得资源、教育和就业机会等方面面临的不平等。在绿色经济转型背景下,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对个体的教育水平和技能提出了较高要求。然而,低收入群体在这一方面处于劣势,导致其被排除在绿色经济的受益范围之外。结果不公平是指在社会资源分配和成果分享上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即使个体或群体在起点上相对平等,但由于市场机制、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最终可能导致收入分配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脱贫地区的农户往往参与产业链的初级生产环节,抗风险能力弱且缺乏议价权,无法公平分享产业链增值红利。

3. 治理失灵。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多目标属性,决定了其对制度安排的高要求^[3](P41-54)。在实践中,制度框架薄弱、政策协调不足和财政资源有限等治理问题频发^[6](P29-146),作为人为因素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形成制约。制度框架薄弱是阻碍包容性绿色增长实现的重要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为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或者现有法规未能得到严格执行。政策协调不足是治理失灵的重要表现,实践中不同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如经济发展目标与生态保护目标往往难以兼顾,地方政府进而有不完全执行环境政策的动机。上述问题形成的深层原因是多层级治理目标错配。中央政府以公共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而地方政府则具有谋利型特性^[23](P74-90)。两者目标的冲突使得绿色发展政策在执行中往往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此外,由于财政能力有限,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安排上不得不优先保障民生等基本支出以及短期经济发展项目,对绿色转型投入不足。

(三) 产业融合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内在逻辑

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需要破解市场失灵和公平失灵,而治理失灵是其共同突破口,尤其需要在现实经济场景中找到可行路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发展中国家被视为促进产业振兴、适配需求升级的主动适应策略,是在技术创新、市场需求变化和政策支持等综合作用下的发展模式。借鉴姜长云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院和农经司课题组的研究^[24](P43-49)^[25](P3-28),本文将农村产业融合界定为以技术创新和政策支持为动力,以产业发展方式转变为结果,依托农业,通过产业间的融合渗透与交叉重组,形成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最终实现产业发展壮大和农民就业增收的过程。产业融合形成了产业链延伸、农业内部交叉、功能拓展以及先进要素渗透等四种典型模式^[12](P120-129)。作为一种整合资源、优化结构和协调多主体协作的发展模式,产业融合在理论上能够克服三大失灵,成为实现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可行路径(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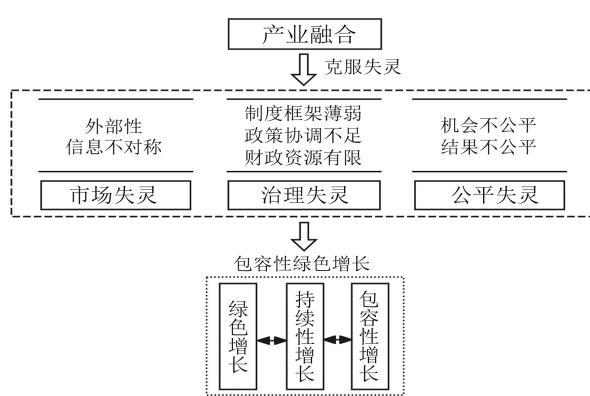


图1 产业融合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分析框架

1. 产业融合弥补市场失灵。产业融合能够缓解市场失灵导致的资源低效配置。首先,产业融合促进了城市的技术、人才、信息、管理等先进要素流向农村^[26](P105-117),促进绿色技术、数字技术的扩散推广,能够缓解传统农业中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核心问题,减少负外部性影响。其次,产业融合通过纵向产业链的延伸,使不同环节的市场主体形成利益绑定关系,加工及销售方对原料质量有严格要求,农户在种植过程中要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同时实施轮作休耕等生态友好型生产模式,降低农业生产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此外,通过发展农文旅融合等模式,产业融合尤其能

够实现生态价值显化。农业相关资源的生态价值在农文旅融合中通过市场机制得到充分挖掘^[17](P85-104),形成生态保护的内在激励。最后,品牌营销是全产业链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产业融合通过品牌打造等方式,构建透明的市场环境,提高市场效率。

2. 产业融合缓解公平失灵。产业融合的主要社会目标是使农户在利益分配格局中获得较以往更多

的收益^[27](P17-28)。通过就业参与平等和收益普惠性,产业融合保障了前端的机会公平和后端的结果公平。就业参与平等强调所有个体都能享有公平的就业机会。一方面,产业融合具有受益人群包容性的特征,强调包括农村弱势群体在内的全体成员在就业机会、发展内容上的平等^[26](P105-117);另一方面,产业融合中的技能培训可起到能力补偿的作用,使原本不具备竞争优势的群体获得与其他劳动力竞争同等岗位的能力,从而实现实质性的就业参与公平。就结果公平而言,产业融合通过不同产业在农村的渗透融合与交叉重组,重构了传统的产业链与价值链^[13](P8-18),使农户摆脱传统农业生产环节的低附加值困境,进入收益率更高的环节。纵向延伸扩大了农户在产业链中的参与深度,使其能通过初加工、品牌溢价获取更稳定的利润;横向拓展则促使农户由生产者向服务提供者转变,服务环节更接近终端消费者,享受更高的利润回报。

3. 产业融合破除治理失灵。市场失灵和公平失灵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破除其面临的治理失灵障碍。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到农村产业融合专项政策,顶层设计都明确要求构建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同时强调绿色化生产与弱势群体增收。农村产业融合的制度安排明确要求制定规则以规范多主体行为,减少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降低协作成本,保障协作的稳定性和长期性,确保增长成果的公平分配。其组合式政策设计将绿色增长与包容性目标嵌入产业发展规划,实现多目标协同。最后,农村产业融合能为包容性绿色增长提供政策和资源保障。针对农村地区在资金、技术和人才方面的短板,各地政府通过财政、税收、金融和技术等多维度的政策支持,构建产业融合的多重保障机制。

基于上述分析,实现包容性绿色增长需要破除市场失灵、公平失灵以及治理失灵的障碍,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则具备破除包容性绿色增长障碍的潜在条件。

(四) 研究设计

案例研究能够对现象进行细致的描述,适合回答“如何”的问题^[28](P20-42),尤其是单一案例研究能够更容易地把“是什么”和“怎么样”说清楚。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究产业融合如何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因此,采用在生态和产业空间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县域单案例研究。我们选择以湖北省神农架林区作为案例对象,有如下两个方面的理由。其一,代表性原则。神农架林区是脱贫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以及国家公园,面临迫切的包容性绿色增长要求。与之类似,我国原扶贫工作重点县中有434个拥有双重身份,既属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又是贫困县^[29](P26-33),在发展过程中不仅面临脱贫压力,还承受着更为严格的生态约束。这类地区在脱贫前面临如何在绿色约束下实现适度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问题,在脱贫后则面临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和绿色增长协同的难题。选择神农架林区作为案例对象,对我国广袤的具有绿色生态功能的欠发达地区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其二,启发性原则。神农架林区产业融合起步较早,选择了兼具融合特征、生态特征与民生特征的大旅游、大农林、大健康产业,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产业融合取得较大成效,产业结构逐步调整,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稳步增长,收入结构较为合理,农户绿色发展意识大幅度提升。此外,林区山高路远,地域广袤,生态及产业相对自成一体,包容性增长及绿色增长之间的关系更易于考察。研究神农架林区如何通过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将为其他地区提供更为清晰的启示。在数据收集上,本文采取长期跟踪调研的方式收集资料。笔者团队分别于2019、2021、2023和2025年对案例区开展调研,通过半结构化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及文本搜集等方法积累了神农架林区发展的大量跨期资料。

三、案例呈现

本部分以神农架林区为典型案例,围绕林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概况、产业融合发展历程以及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三方面展开分析,旨在为欠发达地区通过产业融合实现包容性绿色增长提供实践范例。

(一) 神农架林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概况

神农架林区位于湖北省西部,直属湖北省管辖,是中国唯一以“林区”命名的县级行政区,是我国重

要的重点生态功能区之一。神农架林区国土面积 3253 平方公里,整体地形地貌以山地和林地为主。2024 年末全区共有户籍人口 7.64 万人,常住人口 5.79 万人。近年来,神农架林区树立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在创建国家森林公园的同时,发展以“大旅游、大农林、大健康”为代表的具有高度融合性的绿色产业体系,产业结构得以调整优化,农村居民收入稳步提高。2024 年林区三次产业结构为 6.37:35.65:57.9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5588 元。

在绿色发展方面,林区保持了较低的资源消耗水平和较高的生态质量。林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91.16%,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位列全省市州第一。2023 年单位 GDP 能耗为 0.38 吨标准煤/万元,远低于全国平均 0.48 吨标准煤/万元的水平^①。林区包容性发展同样成效显著。2018 年消除农村绝对贫困并退出国家级贫困县序列,城乡居民收入比由 2018 年的 2.79 降至 2024 年的 2.52。近年来,林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居民,2024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6.32%。

(二) 神农架林区产业融合发展历程

根据关键事件和政策的时间节点,本文将神农架林区的产业融合发展过程分为产业融合萌芽期、产业融合形成期以及产业融合成长期三个阶段。这个过程从产业融合角度显现了从萌芽到形成、成长的演化,从产业发展角度则显现了从初步转型、融合转型到升级的演化(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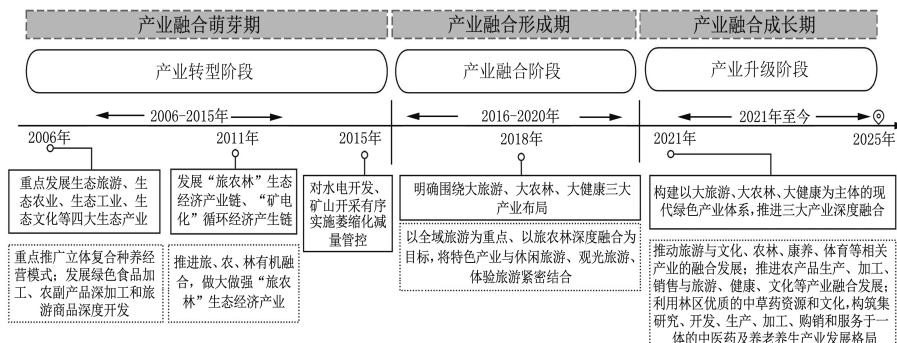


图 2 神农架林区产业融合发展历程

1. 产业融合萌芽期(2006-2015年)。神农架林区曾长期发展“木头经济”“石头经济”“水头经济”^②等资源开发型经济,带来的环境压力凸显。2000 年起,林区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天然林全面禁伐,森工及相关产业停产,对水电、矿产开发实施管控,逐渐向绿色、有机的生态产业方向发展。一是调整产业布局。林区于 2007 年提出以“旅农林”生态产业链为主布局产业发展,并在“十二五”时期正式布局,强调要推动旅农林产业有机融合。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国省道等级化、区乡公路黑色化、村组公路网络化,完善重要景区景点水、电、路及观赏带建设,实现景区景点通信全覆盖。三是建设盘水生态产业园区,打造旅游产业集聚基地和绿色循环经济示范区。四是基于文化资源打造生态旅游目的地形象。林区旅游资源与“原生态”“野人”等概念紧密结合,构建起了具有高辨识度、差异化的旅游品牌。

2. 产业融合形成期(2016-2020年)。林区在此阶段确立全面脱贫与产业绿色转型双重发展目标。2016 年和 2018 年,林区先后实施《神农架国家公园保护条例》和《湖北省天然林保护条例》,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实施严格的生态红线管理。同时,林区利用脱贫攻坚政策支持,不断推动产业融合发展。2018 年

^① 2023 年全国单位 GDP 能耗未正式公布,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23》,2022 年这一数值为 0.48 吨标准煤/万元。2023 年中国单位 GDP 能耗比 2022 年下降 0.5%,故 2023 年全国单位 GDP 能耗为 0.4776 吨标准煤/万元,四舍五入为 0.48 吨标准煤/万元。此外,由于 2024 年神农架林区单位 GDP 能耗尚未公布,故以 2023 年数据说明。

^② “木头经济”即原木砍伐,“石头经济”即矿产开采,“水头经济”即小水电开发。

以来,林区致力于推进“大旅游、大农林、大健康”生态产业融合模式^①,并采取了产业融合行动策略。一是政策支持。林区围绕资金、土地等关键要素,构建财政专项资金倾斜、税收减免、金融贴息、用地优惠、特色农产品保险、企业准入环境影响评价等支持保障政策。二是技术创新。林区依托华中农业大学、湖北中医药大学等高校搭建科研平台,为特色农产品品种优化、栽培技术改良和绿色生产提供技术支持;推动农业技能培训常态化,利用农闲时间开展红高粱种植、春茶采摘等实用技术培训。三是培育主体与拓展市场。林区联合产业园区内多家骨干企业成立了“神农架优质农林特产产业发展联盟”,以破解资源整合不足问题;打造“神农架购”电商区域品牌,打通城乡物流双向通道。四是促进农户参与和收益分享。林区采取“企业(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等联结带动模式,通过订单农业、土地流转等形式进行利益分配,拓展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渠道。

3. 产业融合成长期(2021年以来)。2021年以来,林区面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产业绿色转型等多重任务。林区利用推进乡村振兴机遇,采取产业升级行动策略,进入产业融合成长期。一是政策优化。针对“大旅游、大农林、大健康”产业,林区分别制定了“十四五”专项规划,从战略层面明确了绿色产业融合的发展路径;同时制定民宿奖补等激励政策,降低农户进入新业态的门槛。二是技术深化。林区强化产学研合作和技术推广,进一步解决包括种植、养殖管理和生态保护在内的技术难题;同时加快先进技术应用,如在民宿经营中推广智能用电设施,推动林区能源转型。三是市场规范化。林区推出“神农架®”商标,成立“神农架®森林产品标准委员会”,制定严格的产品标准和质量管理体系,以确保森林产品的质量控制;通过协商转让、维权诉讼等手段应对外部侵权和抢注问题。四是强化农户利益联结。林区推广“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户”等模式,通过订单农业、土地流转、股份合作等形式,促进农户在产业链中的深度参与。

(三) 神农架林区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神农架林区的一二三产业融合模式丰富,前述四种典型类型在林区都有成功范例。随着时间推移,林区产业融合模式由以产业链延伸型、内部交叉型融合为主导演变为以功能拓展型融合为主导,技术渗透型融合也在此过程中不断涌现与发展。

1. 产业链延伸型融合模式。产业链延伸型融合是以农产品终端消费为导向,形成从原材料采集、生产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条。神农架某药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创立于2018年,主营天麻加工业,产品包括鲜天麻、干天麻片、天麻粉等。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推动中药材生态种植、加工、仓储及物流,开发、生产和销售药食同源产品,形成生态中药材全产业链。公司通过订单农业促进农户生产,引入天麻人工菌棒替代传统菌材,实现绿色生产;利用“神农架®”公共商标解决消费者信息不对称问题。大九湖镇依托集镇旅游服务,实施“一村一品”食材本土化项目,实现镇域本土食材“产、购、销”一条龙发展模式,通过订单农业和基地建设带动各村的专业化农业生产。

2. 内部交叉型融合模式。内部交叉型融合是林区产业融合的基础模式,主要形式是依托林地资源发展林下经济,有中药材、珍稀菌等林下种植业,生猪、家禽、中蜂等林下养殖业,在限制传统资源型林业经济的条件下,显著提升了林下种养业的综合效益。例如,某乡2022年发展林下药材种植1000余亩、林下食用菌40余亩、林下豆类杂粮300余亩、林下中蜂养殖2700余群、森林鸡3万余只,实现了立体林下经济模式。

3. 功能拓展型融合模式。功能拓展型融合是林区产业融合的主要模式,形成了农文旅融合、康旅融合、体旅融合、工旅融合等形态。其中,农文旅融合是林区功能拓展型融合的典型模式,尤以茶文旅融合

^① 要特别指出的是,林区的产业融合与传统的三次产业分类标准不完全对应,不同于官方定义的三次产业融合概念。林区产业融合中,旅游产业、农林产业和健康产业各自已经具有深度融合的产业特征,同时,也有三大产业互相融合之意,林区的产业融合实践既是基于林区资源、生态、区位等条件作出的选择,也进一步丰富了产业融合的内涵与外延。

居多。神农架某茶业集团在木鱼镇某村建立包括采摘茶园、茶叶加工生产线、购物供销社、茶祖博物馆以及茶文化演绎中心在内的茶旅融合综合体,吸引游客深度参与。此外,木鱼镇在另一村建设茶园游览设施和采茶基地,打造体验式民宿集群,实现农户、民宿主体、集体经济共同发展。康旅融合是功能拓展型融合新形态,主要是康养产业与旅游业结合,并且向优质食材、药食同源产业延伸。除此以外,林区还依托旅游业发展会议经济、体育经济等。在这一模式下,缺乏资金、技术或经营能力的农户,多采取土地流转、订单合同、参与就业等形式与企业或合作社建立合作关系;而一些具备一定市场意识、经营能力的农户,则利用闲置农房经营农家乐、民宿等农业体验项目。

4. 技术渗透型融合模式。随着产业融合的推进,技术渗透型融合模式也逐渐涌现并发展迅速。林区通过先进的生物、电子信息等技术对农业进行渗透,形成了生物农业、“互联网+农业”等新兴业态。林区利用玉米芯等农业废弃物生产人工菌棒,生产周期由1年缩短至40天,生产成本降低30%-40%;他们还引入智能育雏设备,实现了喂料、通风、清粪等环节的智能化控制,降低了人工成本,确保了育雏出栏率。大九湖国家湿地公园建成5A级全电绿色智慧景区,在生态旅游中进一步推进节能环保。林区还搭建消费帮扶832平台、神农架购等专门电商设施,组织“人工智能AI+农产品销售”等培训,以实现数字技术“接入—使用”的双维赋能。

四、机制解释

神农架林区产业转型与绿色发展历程显示,建立在生态资源禀赋基础上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三赢,为农户创造了就业增收机会,具备包容性绿色增长特征。这些成就在林区“十四五”规划等文件中都可见端倪。那么,林区的包容性绿色增长何以实现,产业融合在其中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对政策与实践沿革的梳理以及机制分析表明^①,林区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是在新时代背景下由国家发起的外生性生态保护战略引发的内生性、系统性产业变革。在产业融合战略与政策推动下,通过制度完善和政策落实,并借由技术赋能、结构优化及利益共享等产业融合机制,克服包容性绿色增长面临的治理、市场以及公平失灵。产业绿色转型不仅克服了市场失灵,还以产业融合为中介机制克服包容性绿色增长障碍。不仅如此,包容性绿色增长在取得成效后,反过来对产业融合产生正反馈作用,形成良性循环(见图3)。

(一) 生态保护战略引发内生性产业变革

神农架林区包容性绿色增长始于国家的生态保护。在初期阶段,林区生态保护战略属于国家及省级层面的战略选择,对林区而言则是外生性、非自主的战略任务。早在1980年,就有专家呼吁对因砍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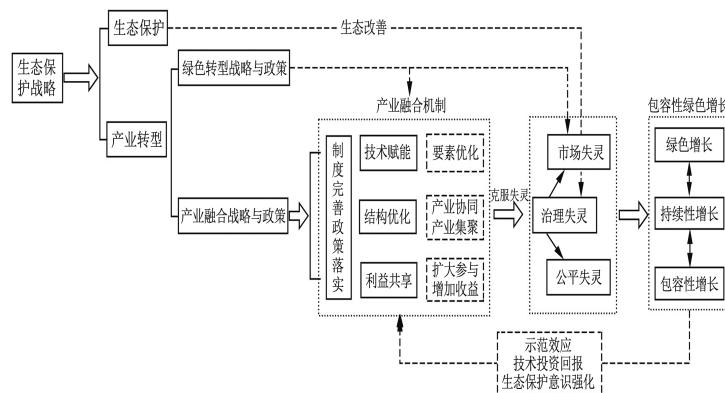


图3 神农架林区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实现机制

^① 本节材料如无说明,均来自林区政府《神农架林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事记》。

而濒危的神农架林区进行生态干预。1982年,湖北省政府发文建立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启动了漫长的生态保护历程。随后直至2000年,林区才正式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全面停止森林采伐。2002年,林区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试点,保护区内停止一切导致生态功能退化的开发活动和其它人为破坏活动。《神农架国家公园保护条例》于2016年生效,《湖北省天然林保护条例》于2018年实施,林区生态保护上升到法治层面。

为落实上位性的生态保护战略,林区在采取生态保护措施的同时实施产业转型战略。林区于2007年编制《生态保护与林区经济协调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2014年编制《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规划》,2023年编制《自然保护和统筹发展规划》,始终坚持了“两条腿”走路的思路。一方面,林区认真落实国家和省级生态保护战略。2017年和2022年,林区分别制定《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2015年和2019年,林区先后制定影响生态环境的小水电站关停方案,2023年小水电关停任务全面完成。日益严格和主动的生态保护有利于林区生态环境修复和改善,为发展绿色经济创造制度和生态条件。另一方面,林区长期推动产业转型,从被动、非自愿关停开始,逐渐增强自主性。首先是实行产业绿色转型战略与政策。“十一五”规划提出发展旅游、农业、工业和文化并重的四大生态产业;“十二五”规划提出发展生态经济,包括旅农林生态经济产业链和矿电化循环经济产业链,此时还不愿放弃水电和矿业;“十三五”时期实施绿色崛起战略,建立以旅游为主导的生态产业体系,对水电和矿业实施减量管控;“十四五”时期则致力于构建以“大旅游、大农林、大健康”为主体的现代绿色产业体系。其次是实行产业融合发展战略与政策。林区的产业融合发展与绿色转型同步发展,既有两者一体化推进机制,也有产业融合自主推进机制。产业融合在林区最早采取立体复合种养经营模式,随后,旅农林协同发展思路日益清晰,后来又融入健康产业,形成旅游、农林、康养协同发展局面。

(二) 产业融合破除包容性绿色增长障碍

本节聚焦于产业融合在林区产业转型中的重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其破除包容性绿色增长障碍的内在机制。

1. 产业融合发展是林区产业转型的基本路径。自从实施生态保护战略以来,林区不断推进产业转型,分为产业绿色转型和产业融合发展两大举措,相关产业政策则可划分为产业选择政策、产业融合政策以及产业支撑政策。尽管三类政策功能定位不同,但重叠度高,关联性强。林区绿色产业转型的政策选择性明显,明确支持鼓励大旅游、大农林、大健康等生态友好产业,限制和禁止小水电开发、矿产开发等资源粗放利用产业。产业融合发展政策即推动跨产业协同发展,林区近年来的产业选择天然地以产业融合为推进路径,主要是立足当地生态资源的农林产业和紧密围绕高品质生活的居民服务业,后者以前者为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与现代城市经济完全依托市场竞争选择优质原料不可同日而语。同样地,产业融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自我激励机制,但当面临非经济多重目标时,就不大可能自发实现,而是嵌套于政策支持、技术进步以及市场需求变化等复杂情境之中。作为脱贫县以及湖北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林区享受了较为优厚的政策扶持,重点用于乡村产业振兴,尤其是产业融合项目。各类叠加政策通过明确融合方向、规则约束以及资源支持,破除了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实现障碍。因此,林区的产业转型战略以包容性绿色增长为导向,而产业融合在其中发挥了双重作用,即作为发展手段的直接促进作用以及作为产业绿色转型实现方式的中介作用。

2. 产业融合破除包容性绿色增长障碍。林区产业融合方向的选择符合当地生态功能定位、社会发展方向以及优势资源禀赋,有效地避免了资源错配并且协调了多重目标冲突。神农架通过设定生态保护红线、产业准入标准以及利益分配规则,构建明确的激励约束机制,将包容性绿色增长目标嵌入产业实践,得以克服治理失灵。政府实施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用地优惠、贴息贷款等优惠政策,为绿色增长基础上的共享发展提供全方位的资源支持。在明确林区功能定位、构建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政策落实的基础上,产业融合中的技术赋能机制、结构优化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能有效地克服三大失灵,对包容

性绿色增长发挥积极促进作用。

产业融合通过技术赋能机制实现要素优化。其一,林区产业融合通过延长产业链、拓展农业功能,使绿色生产成为农户进入高端市场的必选项。在产业链延伸型融合模式中,神农架某酒业公司为确保优质酿酒红缨子高粱供应,采取“公司+农户”模式,为农户提供优质种子并要求必须采用标准化、绿色化的生产方式。在功能拓展型融合模式中,农业与旅游业结合使生态环境成为经济资产,增强农户转向绿色生产的经济动力。在技术渗透型融合模式中,技术扩散应用全方位地提升了生产效率和市场流通效率。电子商务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减少了农产品滞销和供需错配问题,降低了流通损耗和存储成本;人工菌棒技术的推广缩短了天麻生产周期,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市场供应的稳定性。其二,产业融合促进了城乡要素流动,加速了资金、技术、人才向农村聚集,消除了绿色技术的进入壁垒。其三,多样化的培训形式,如集中式课程、合作社组织的实地指导及线上课程,提高了技能培训的普惠程度。本课题组开展的林区农户抽样调查显示^①,高达75.65%的受访户参与过技能培训。

产业融合通过结构优化机制实现资源聚集共享和生态价值显化。具体而言,这一过程通过产业协同和产业聚集,显著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了生态效益的实现。首先,产业协同通过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两种方式,推动资源整合与生态价值显化。纵向延伸以整合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为核心,将初级产品转化为高附加值商品,提高资源的经济效益。横向拓展则通过农业与旅游、文化、康养等非农产业的功能整合,赋予生态资源新的经济和文化价值,显化了生态保护的正外部性。其次,产业集聚为产业融合发展创造了实现条件。林区某生态产业园区聚集了一大批以当地农林产品为基础的深加工产业、科创平台以及公共营销平台,一些省级旅游度假区成为连接游客与当地农特产品的集散地。产业集聚通过集中管理、共享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实现资源共享、协同生产和高效交易,显著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和分散生产带来的市场失灵。

产业融合通过利益共享机制扩大了农户的参与和受益。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使不同利益主体,尤其是普通农户能够公平参与并从融合发展中受益。林区的四种产业融合模式多数情况下都能带动普通农户参与,通过产业链延伸、复合种养以及功能拓展,创造更多高附加值的创业环节,为农户创业提供了多样化机会。林区农户能够通过土地流转或订单农业等形式,以较低的成本与企业形成稳定的产销关系,同时也能通过股份合作等形式介入更深层次的产业链。民宿聚集以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农户以较低投入成本参与民宿经营和销售自家农特产品。就利益分配而言,企业与农户通过合同约定,根据生产投入的比例合理分配收益,避免企业侵占小农户的利益。此外,针对弱势农户,林区会施行倾斜性帮扶,确保他们不会因资源不足而被排除在产业融合之外。在风险保障方面,农业保险能够分担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帮助农户稳健经营。抽样调查数据显示,高达81.74%的受访户参与了某种形式的产业融合,且参与户的人均收入显著高于未参与户^②。

(三) 包容性绿色增长对产业融合产生正反馈效应

当产业融合产生包容性绿色增长积极成效后,该成效可通过示范效应、技术投资回报效应以及生态保护意识强化来促进产业融合的发展。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实现意味着生态环境的附加价值得到了经济利益维度的充分认可,进而扩大产业融合的范围与深度。增收效应一方面对未参与农户产生示范作用,使其认识到绿色生产和产业融合的经济可行性,因而主动加入产业链;另一方面,对已参与农户而言,收入增长增强了其市场信心和风险承受能力,使其更愿意加深参与,如扩大规模,延长产业链,拓展体旅、康旅等多种模式,推动产业融合的纵深发展。包容性绿色增长增强了技术投资意愿,加快了产业融合的升级进程。产业融合中绿色生产模式的收益预期以及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等的规则约束使政府、企业和

^① 此次调研于2023年4月进行,共收集115份有效农户数据。

^② 对农户问卷数据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后的结果。计算过程和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农户对技术创新的投资力度随之增强,如引入智能育雏、绿茶区块链溯源系统,投资打造5A级全电绿色智慧景区,推动新技术在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的更广泛应用。例如,神农架某集团在2023年成立,计划整合生物科技型企业,推动林区林下经济的传统种养模式全面转型。包容性绿色增长实现了生态环境价值显化,农文旅等产业融合形式的收益使农户意识到生态环境质量与自身收入的直接关联,在林区内不断形成自主性生态保护意识,进而为产业融合提供可持续的生态资源。正如林区农户覃某所说:“湖水污染了,谁还来这里旅游?只有保护好大九湖的生态,才能保住子孙的‘金饭碗’。”

五、结 论

欠发达地区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跟上协调发展进程,尤其是贫困地区如何走上转型发展道路?与新发展理念高度吻合的包容性绿色增长也许是一条可行的弯道超车的转型道路。产业融合不仅是一般意义上乡村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的抓手,在脱贫地区也是实现产业振兴的重要路径。对产业融合如何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这一问题的回答对贫困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以独具生态优势、实施严格生态保护但经济相对欠发达的神农架林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内涵、实现障碍以及产业融合破除障碍的潜在机制与现实表现,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第一,包容性绿色增长是兼具生态脆弱性和特定生态环境优势的欠发达地区的可行选项。在空间开放条件下,在实施严格生态保护的同时,欠发达地区能将因保护而改善的生态环境优势通过发展绿色经济转化为经济价值,则各类包容性绿色增长障碍都可在一定程度上破除。外生性生态保护使环境治理更早更广泛地覆盖至全区域,强制推动绿色技术替代与结构优化,降低单位产出的环境负荷。产业融合实现的利益共享增强了绿色转型的广泛性与稳定性,激发了更高生态保护意愿,提升了环境治理的执行力,得以在较低收入水平实现生态环境改善。这意味着,包容性绿色增长可以改变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演化轨迹并改善其形状,使预期的EKC曲线顶点向左移动。第二,区域整体性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战略为包容性绿色增长创造了有利的环境条件。整体性生态改善避免了生态环境价值外溢导致的外部效应,克服了信息不对称并且有利于产品生态价值实现。严格的生态保护战略、法规及制度有效地避免了地方政府经常存在的与上级政府目标错位、环保让路等治理失灵,为包容性绿色增长塑造了可信的制度环境。第三,产业融合有利于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产业融合发展由政府推动,兼顾多方主体利益,顺应创新驱动规律,其内在融合逻辑能够破除包容性绿色增长面临的市场失灵、公平失灵以及治理失灵。在产业融合政策的引导下,产业融合制度得以完善,政策得以落实,继而通过技术赋能、结构优化、利益共享机制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技术赋能机制通过要素优化提供技术引入的动力及能力,弥补市场失灵与公平失灵;结构优化机制通过产业协同和产业集聚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区域产业竞争力,破除市场失灵与公平失灵障碍;利益共享机制通过保障多方主体的公平参与和成果共享,缓解公平失灵。第四,包容性绿色增长在取得成效后可以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产业融合发展,二者之间存在双向互动的逻辑关系,其中的反向影响机制主要是经济收益的激励示范效应、技术投资回报预期以及生态保护意识强化。

值得注意的是,神农架林区当前的包容性绿色增长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多目标协同仍面临挑战,尽管林区生态文化价值巨大,但当地经济增长、居民收入水平仍比较低,流量控制的高端旅游发展模式尚未真正落实,旅游业规模扩张会带来新的环境压力;二是本地旅游、农林、康养产业之间的循环尚未完全打通,已有产业融合只在一定程度和较低层面上实现,生态农林产品交易成本高且当地消费率低;三是林区旅游业存在季节性和易受外部冲击特点,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存在较大的脆弱性,淡旺季客流差异明显,相应地会削弱产业融合的韧性;四是对于包容性的理解还不够全面,目前只考虑到一般农户以及脱贫户,不仅未关注低收入农户,更没有从赋能、赋权角度真正夯实包容性发展基础。例如,调研发现林区热门地区和相对偏僻地区民宿业水平和行情差距极大,表明发展的包容性亟待进一步提升。

尽管如此,神农架林区案例仍然呈现了生态资源富足的欠发达地区迈向包容性绿色增长的良性发

展进程。高位推动的外生性生态保护战略逐渐内化为自觉的生态保护行为,并以优良生态为基础,以产业融合为基本发展理念和推进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包容性绿色增长障碍。本研究的启示意义在于,其他欠发达地区需重视市场失灵、治理失灵及公平失灵的程度与表现,采取克服之道以推进具有弯道超车特点的包容性绿色发展道路。

第一,将整体性生态保护作为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最大底色。一些地区基于资源环境条件、产业发展战略以及财政能力,可能在生态保护方面只采取了局部性措施,使得区域内生态环境水平不均衡。尽管这种做法及其结果无可厚非,但仍会导致生态效应外部性、以次充好的投机行为以及生态价值难以实现等市场失灵问题。从长远来看,实行共同标准下的整体性生态保护有利于克服这些障碍。神农架林区观察到的提级统筹生态保护战略是一条可行之道。第二,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和市场定位确立产业融合发展方向。受限于资源和市场有限性,各地应开展区位条件分析,引导资源向优势区域和优势产业集群中。同时,政府应强化生态监管与产业规划的协调性,建立“生态承载力评估+产业准入标准”的双重管控机制。第三,加大县域科技创新投入,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可由政府牵头,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共同参与建立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推动跨学科合作与技术攻关。同时,优化技术推广与应用机制,鼓励农业企业、合作社、农技推广部门联合开展技能培训,依托数字平台推广技术,保障不同人群机会公平。第四,依托产业融合健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差异化嵌入模式平衡不同主体的利益分配,使产业链中的各类参与者根据资本投入、技术水平、市场链接能力等嵌入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形成多层次分工。同时,建立健全风险共担机制,有效分散产业融合过程中的潜在风险。

参考文献

- [1] 李华,董艳玲.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差异探源——基于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考察.财经研究,2021,(8).
- [2] 杜焱强,王继应,孙雪峰.“生态颜值”何以持续转化为“农民财富”?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10).
- [3] 周小亮.包容性绿色发展:理论阐释与制度支撑体系.学术月刊,2020,(11).
- [4] M. Bakker. *Tourism and Inclusive Growth: Towards a Diagnostic Framework*. Wageningen: Wageningen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2021.
- [5] D. Resnick, F. Tarp, J. Thurlow.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een Growth: Cases from Southern Africa.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2, 32(3).
- [6] World Bank. *Inclusive Green Growth: The Pathway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12.
- [7] 杨雪星.包容性绿色经济增长指数构建与实证研究——基于G20国家数据.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6).
- [8] 吴武林,周小亮.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测算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8,(1).
- [9] 张涛,李均超.网络基础设施、包容性绿色增长与地区差距——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4).
- [10] 周锐波,吴云峰,宋佳晞.共生共荣:工业智能化发展与包容性绿色增长.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4,(5).
- [11] 魏敏,李书昊.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11).
- [12] 肖卫东,杜志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内涵要解、发展现状与未来思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
- [13] 江泽林.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再探索.农业经济问题,2021,(6).
- [14] 陈素梅,李钢.贫困地区的包容性绿色增长何以可能?——基于江西省信丰脐橙产业的案例.企业经济,2020,(12).
- [15] 牛文涛,郑景露,唐轲.农村三产融合赋能农民就业增收再审视——基于河南省孟庄镇、龙湖镇、薛店镇的案例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22,(8).
- [16] 齐文浩,李佳俊,曹建民等.农村产业融合提高农户收入的机理与路径研究——基于农村异质性的新视角.农业技术经济,2021,(8).
- [17] 胡平波,钟漪萍.政府支持下的农旅融合促进农业生态效率提升机理与实证分析——以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

- 范县为例.中国农村经济,2019,(12).
- [18] Peter M. Garber. *The Mexico-U.S. Free Trade Agreement*.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3.
- [19] 世界银行.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 [20] ADB. *Toward a New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 a New Asia: Report of the Eminent Persons Group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07.
- [21] George A.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0, 84(3).
- [22] A. Singer. Justice Failure: Efficiency and Equality in Business Ethic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8, 149(1).
- [23] 张华.地区间环境规制的策略互动研究——对环境规制非完全执行普遍性的解释.中国工业经济,2016,(7).
- [24] 姜长云.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和着力点.中州学刊,2016,(5).
- [25]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院和农经司课题组.推进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问题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16,(4).
- [26] 卢京宇,郭俊华.三产融合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逻辑机理与实践路径.农业经济问题,2023,(11).
- [27] 苏毅清,游玉婷,王志刚.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理论探讨、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中国软科学,2016,(8).
- [28] 罗伯特·K.殷.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 [29] 张化楠,接玉梅,葛颜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扶贫长效机制研究.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12).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and Inclusive Green Growth

Evidence from Shennongjia Forestry of Hubei Province

Tan Xuewe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iu Mengt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How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less-developed areas is a critical issue in urgent need of addressing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Inclusive green growth aligns closely with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but is often haunted by obstacles such as market failures, equity failures and governance failures. As a fundamental approach to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can effectively overcome these three failures through mechanisms such as technology empowerment,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and benefit-sharing, thereby actively promoting inclusive green growth. Regional holistic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acilitate the conversion of ecological advantages into economic value, creating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to drive inclusive green growth. The positive outcomes of inclusive green growth generated b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rough demonstration effects, returns on technological investments and enhanced ecological awareness, in turn, foster further advancement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creating a positive feedback loop. Inclusive green growth can shift the anticipated peak of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to the left, offering a viable pathway for less-developed areas characterized by ecological fragility and unique environmental advantages to transition towar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inclusive green growth; green transition; less-developed areas

■ 作者简介 檀学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北京100732;

刘梦婷(通讯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生,北京102488。

■ 责任编辑 涂文迁